

南部非洲人类学研究综述*

徐薇

【摘要】人类学在南部非洲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很多著名的理论、方法、学术争论都源自于人类学家对南部非洲大陆长期而执着的田野实践。本文根据人类学在南部非洲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概述了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的经历及其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人类学家笔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介绍了人类学在南部非洲发展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交流平台——“南部非洲人类学联盟”。

【关键词】人类学；南非；英国人类学；德国人类学；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壮大同非洲有着不解之缘，很多著名的理论、方法、学术争论都源自于人类学家对非洲大陆长期而执着的田野实践。非洲这块沃土同时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从殖民统治开始，人类学在非洲的研究大多是外来者（主要是欧美学者）对生活在这块陆地上的人民与文化的描述与分析，几十年后非洲本土学者才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亚洲人类学学者也开始了对于非洲的探索与发现。

19世纪60年代，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时，非洲还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欧洲学者们把非洲看作一潭死水，又称“黑暗大陆”。然而，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各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非洲沿海地带，开始了臭名昭彰的奴隶贸易。19世纪末期，尽管世界上很多地区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欧洲国家仍在贪婪地攫取非洲大陆上的人力及其他资源。1887年的“柏林条约”赋予西方文明国家占领非洲沿海腹地的权力，确定了在非洲拓展殖民地的共同准则，从此掀起瓜分非洲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探险者、旅行者、传教士涌入非洲，他们的工作和研究即是后来非洲人类学研究的雏形。

联合国南部非洲次分区包括五个国家：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前均属于南非的领地，由英国统治；纳米比亚在1968年以前称为西南非洲，它于1884年沦为德国殖民地，1915年被南非占领，此后直至1990年宣布独立，其间一直由南非统治和管理。因此，在殖民时期，整个南部非洲几乎都在南非的统治之下，而南非的历史变迁、社会运动深深影响了南部非洲人类学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早期，南非大学里教授的人类学主要来自两个传统：英国人类学与德国人类学（德语称 *Volkekunde*，译为民俗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以英语为媒介教学的科系继承了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 本研究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博茨瓦纳传统部族的现代变迁’（项目批准号：11YJC850027）”，“201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号：11JDFZ02YB）”的研究成果。

参阅维基百科：南部非洲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83%A8%E9%9D%9E%E6%B4%B2>

之后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南非语为媒介教学的科系称为民俗学，建立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国人类学或者说更接近德国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然而说英语的社会人类学者和说南非语的民俗学者并不是截然两分的，一些民俗学者同样受到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的强烈影响，关注文化研究，对布朗所提倡的社会结构研究却缺少热情。随着种族隔离等政治意识形态在南部非洲愈演愈烈，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可以说是各行其道。1967 年成立的校际人类学家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f Anthropologists），为不同派别的人类学家在一起交流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然而很多南非人类学家仍以社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区分彼此，暗示其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有明显的差别。其主要分歧在于，以南非语为媒介的民俗学派延续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人类学传统，颂扬特殊种族的特殊性和持续性，因此为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智力支持；以英语为媒介的人类学派则一直高举人性的旗帜，坚持正义、平等、非暴力、自由的原则，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强调对民主、非种族主义、非男权主义的理解与实践。

综上，在南非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直至种族隔离制度废除、新南非成立，人类学这门学科才有了新的融合与生机。笔者在本文中淡化这些门派之争，重点介绍南部非洲的人类学家及其所关注的南部非洲诸多社会文化问题。

二、南部非洲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在非洲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殖民地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去殖民地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独立运动盛行的十年）；现代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笔者将以时间顺序重点介绍三位在南部非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类学家，事实上，中国人对这些学者的经历和研究至今仍很陌生。

1. 殖民地时期的人类学家

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1905 年生于南非，2003 年卒于英国伦敦，是南非人类学部落社会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知名学者曾是他的学生、同事，从他本人及其著作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艾萨克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在 20 世纪早期移民到南非，当时这个崭新的南非联邦国家是一块充满自由与机遇的土地。艾萨克从小就对生活在他周围的土著和不同人种感兴趣，并且阅读了大量由传教士和探险家写作的有关南部非洲地域文化的书籍资料，这些都出现在他后来的著作中。1925 年，艾萨克考入开普敦大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26 年他考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与塞利格曼（Seligman）、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研究生小组，其中包括很多日后成为奠定现代社会人类学基础的知名学者，包括弗斯（Forth）、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等。

Hammond-Took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South Africa*,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South African anthropology, 1979.

B.A.Pauw, Recent South Africa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No.9,1980, p.315-338.

Peter Fry.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3,1992, p230-231.

艾萨克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南非开始田野、研究工作。1930年他在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工作，当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希尔达·库伯（Hilda Kuper）、埃伦·赫尔曼（Ellen Hellman）是他的学生。1935年艾萨克来到开普敦大学任职，继承了拉德克里夫-布朗的教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此同时，艾萨克于1928年开始对贝专纳兰保护地（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即独立后的博茨瓦纳）进行调研，他广泛而深刻地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生活以及一个非洲族群的当代境遇。他的一系列著作在非洲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独一无二，不仅是因为他卓越的田野工作以及对茨瓦纳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细致入微的研究，还有人类学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艾萨克从研究伊始就强调社会人类学者的责任是要面对任何一个他所关注的社会团体的当代境遇。他研究了茨瓦纳人的政治与法律、基督教对当地的影响、茨瓦纳人的生活等，并将茨瓦纳人特有的社会文化呈现给国际学术界，他的作品也被茨瓦纳领袖所承认，是对茨瓦纳人法律与社会历史最权威的论述。

艾萨克在开普敦大学就职期间，复兴了该校的非洲研究院并且使社会人类学成为该院的核心课程。在这里辛勤工作了15年后，艾萨克于1950年回到母校伦敦经济学院，成为人类学系教授，直至1969年退休。这期间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类学与非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工作，1954至1958年间任社会人类学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主席，1961至1963年间任皇家人类学研究院（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主席。

艾萨克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可谓成果丰硕，他的著作和想法影响了几代人类学者。他让茨瓦纳人这样一个族群被世界所了解，同时他的著作也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茨瓦纳人的工具，但是他对当时移民劳工与土地的研究也为战后重建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持。因此，对于学术研究的功过是非，作为后来人要从历史、客观的角度来评价。

2. 去殖民地时期的人类学家

马克思·格拉克曼（Max Gluckman）1911年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1975年卒于以色列。他是艾萨克的高徒，也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史上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著名的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创始人。他是传统非洲法律研究领域的先驱，强调社会冲突与机制在殖民地时期非洲城市化及社会变迁中解决冲突的重要性。

格拉克曼就读于南非的金山大学，起初他想学习法律，后转学人类学。1936年，他到英国深造学习，在伦敦经济学院参加了著名的马林诺夫斯基研讨班，深受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chard）和布朗结构分析的影响。1936至1938年，格拉克曼在南非祖鲁兰地区做田野调查，主要研究非洲法律体系与地方冲

艾萨克的对茨瓦纳部落研究的代表作有：《茨瓦纳法律与习俗手册》（A Handbook of Tswana Law and Custom, 1938）、《一个非洲部落里的婚姻生活》（Married Life in an African Tribe, 1940）、《移民劳工与部落生活：对贝专纳兰保护地现状的研究》（Migrant Labour and Tribal Life: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1948）、《茨瓦纳部落的族群构成》（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Tswana Tribes, 1952）、《茨瓦纳酋长的赞美诗》（Praise Poems of Tswana Chiefs, 1965）、《部落改革者：茨瓦纳酋长与社会变迁》（Tribal Innovators: Tswana Chiefs and Social Change, 1970）、《茨瓦纳部落的祈雨仪式》（Rainmaking Rites of Tswana Tribes, 1971）等。

参阅 Meyer Fortes, Isaac Schapera: An Appreciation, in Meyer Fortes and Sheila Patterson. (eds.), *Studies in African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75, p.1-6; 维基百科对艾萨克生平的介绍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ac_Schapera.

Jack Harris, Anthropology during the Wa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49, 1947, p.530-532.

突及其解决的动力机制。尽管他仍然秉持着结构分析的传统，但已经有了不同的方向，他认为非洲社会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系统，殖民统治和种族关系会带来混乱的变化，他尝试比较祖鲁兰地区殖民前相对稳定的社会与殖民时期复杂的社会情境的不同，将结构分析应用到更复杂和不稳定的社会情境中去。

1939年格拉克曼就职于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 今赞比亚）的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 Institute），并于1942—1947年担任该所所长。他发展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关注复杂社会、政治关系所带来的种族、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并鼓励在南部和中部非洲研究当地的城市化进程。1947年格拉克曼回到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创建人类学系，他聚集了很多优秀的同事和学生，最终形成人类学史上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多数人都在非洲做田野，强调用细节、个案来说明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冲突的社会机制。此后格拉克曼又出版了很多著作，代表作有《非洲的习俗与冲突》（*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1955），《非洲部落的秩序与反抗》（*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1963）等。

格拉克曼的研究围绕着“社会关系”与“过程”这两个概念展开，并与“习俗”概念相结合进行理论建构，分析各类习俗如何在过程性调节中消化其内在矛盾的社会理论，开创了人类学的冲突理论。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开始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鼎盛时期，使得人类学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完善。

3. 现代时期的人类学家

亚当·库伯（Adam Kuper）于1941年在南非出生，本科毕业于约堡的金山大学，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田野点在今博茨瓦纳境内的卡拉哈里沙漠。博士毕业后他重返非洲，先后在博茨瓦纳和乌干达做田野调查并且在乌干达首都堪培拉的马凯雷雷大学任教三年。1970年至1976年，库伯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1976年至1985年，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非洲人类学教授；1985年至2008年，他在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任教授，并且成为首任人类学系主任。

库伯的早期代表作有《以牛换妻：南部非洲的彩礼与婚姻》（*Wives for Cattle: Bridewealth and Marriage in Southern Africa*, 1982），《原始社会的发明：一种幻觉的变革》（*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1988）。后来，库伯将研究转向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反思和批判，以此来推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其代表作有《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现代英国学派》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1996）。近年来，库伯对社会人类学中所应用的“文化”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代表作《文化：人类学者的解释》（*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1999）。以库伯为代表的现代人类学家，更多地将着眼点从研究对象上转向学科与学者自身，反思人类学中的核心概念与工具。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挑选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做一简要介绍，但我们仍能发现很多相同与不同。艾萨克、格拉克曼、库伯都出生成长在南非，都在英

这时期的代表作有《现代祖鲁兰地区一个社会情境的分析》（*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1940），《南非的祖鲁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Zulu of South Africa*, 1940）。

有关格拉克曼生平简介参阅网站 <http://www.answers.com/topic/gluckman-herman-max>。

关于库伯的生平简介参阅网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m_Kuper。

国受过正规的人类学训练，他们的田野调查也都是从南部非洲起步，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他们的关注点也随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变化。总体来说南部非洲的人类学家们，展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从共时的对异域文化的描写到互时的社会关系与冲突的分析，再到反思人类学自身，每个时期都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作品，值得后人深入学习与借鉴。

三、近三十年来人类学家笔下的南部非洲

笔者主要概述最近三十年来，人类学家对南部非洲主要社会议题的研究，这与南部非洲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在南部非洲风起云涌的劳工罢工事件使得学界更多地关注劳资关系。南非黑人的教育危机问题亦成为20世纪80年代关注的热点，在社会与学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南非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对社会冲突、政治、文化的记录、揭露与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南非社会，同时也帮助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随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人们之间区分彼此的标准不再是种族和肤色，更多地从族群、文化角度来划分，人们更多地使用“文化”、“传统”、“族群”这样的词语来建构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在很多方面表现了人类学对南部非洲社会的反思与批评。

1. 劳工迁移与农村发展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人口移动，1983年通过的南非共和国宪法颁布了黑人家园制度，彻底剥夺南非班图黑人的政治权利，黑人只能居住在其所在的自治区，上百万黑人劳工开始了城市与乡村间循环往复的迁移。人类学家记录了劳工们在村落边界之间迁移的过程及社会影响，由于受到当时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多将关注点放在劳工自治区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上。这些研究也同时引出了一个尖锐的研究方法问题，即如何将微观的人类学研究置入一个更广大的地域框架中？答案莫衷一是，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阅读民族志来体会由于研究对象的活动而引起的研究方法上的变革。人们主要关注的议题仍是如何解释习俗的持续性以及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比如，关于新娘彩礼的研究，为什么在莱索托彩礼很高，在博茨瓦纳则很低。

另一个普遍关心的议题是农村的分化、贫困与发展。人类学家们记录了不断增长的农村贫困化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干涉所导致的，比如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问题。在莱索托，劳工的工资是农村分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2. 城市人类学

在南非，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以及种种政治压力，白人农场主减少了雇佣黑人的数量，致使大量黑人聚居在农村，于是人类学者更多关注黑人家园即黑人自治区，主要研究有：奥兰治自由邦中的夸夸（QwaQwa）家园，东开

参阅 Fist R, *The Mozambican Miner: A Study in the Export of Labour*, Maputo: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1987; Mayer Ped, *Black Villagers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Cape Town: Oxford Univ. Press, 1980; Murray C, *Families Divided: The Impact of Migrant Labour in Lesotho*, Johannesburg: Ravan, 1981.

Adam Kuper, *South Africa and the Anthropologist*.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7.

Van Niekerk, G. J, Law, *Anthropology and land reform in Southern Africa: the case of Zimbabwe*,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Vol 26, 2003, p99-105.

Murray C, *Families Divided: The Impact of Migrant Labour in Lesotho*, Johannesburg: Ravan, 1981.

普省的迪姆巴萨（Dimbaza）家园和德兰士瓦省的科瓦恩德贝尔

（KwaNdebele）家园等。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忽视了城市作为黑人居住地的社会影响与特质。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成千上万的黑人涌入城市定居，有关城市适应的研究才开始出现。主要关注的焦点是生活在城市周边棚户区中的儿童：雷诺（Reynolds P）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对棚户区内的种种怪异现象及高度的流动性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接下来，出现了关于约翰内斯堡的街头儿童的研究，以及流动旅社中儿童生活的研究等。

3. 再现文化

种族隔离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人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是上帝赐予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文化”与种族同义，成为了一个不光彩的词汇，被用来区分人类。因此，南非人类学家们一直以来反对使用“文化”，更强化了“社会”，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人们对文化的观念有所改变。如今人们将文化视为一种媒介、一个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朋友。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呈现的文化政治，国际上新兴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人文学科的社会历史学转向等，所有这些都重新塑造了南部非洲的社会人类学。与此同时，文化的再现也受到了当时交叉学科方法的影响，人类学家、文化学家、音乐理论家、历史学家互相交流思想，丰富各自的研究。

这场再现文化的运动主要由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们倡导，詹姆斯（James D）提出了民族音乐学对分析南部非洲流行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文化是一种变化的资源，赋予人们表述自我与他者的能力。一些学者创造性地将音乐与历史结合，通过研究歌曲来再现人们的信仰和观念，因为歌曲作为一种口头文化，是值得信赖的历史证据，不会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人类学与文学理论的结合亦很有价值，恩德贝勒（Njabulo S Ndebele）用此方法来研究殖民者与殖民地上普通人的意识，所谓“重现普通”。他将文化视为“一系列暗含权力的话语与争论”，质疑殖民地传教士与土著之间的既有概念与权力关系。重新发现文化的意义使得人类学家们开始挑战经济学关心的议题诸如牛、土地这些被经济学家视为商品的东西，在人类学家看来却能反映出代际性别、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人类学家对南部非洲的书写与发现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然而也

Murray C, *Struggle from the margins: rural slums in the Orange Free State*, In F Cooper (ed.) *Struggle for the City: Migrant Labor, Capital and the State in Urban Africa*, London: Sage, 1983, p. 275-318; Niehaus I, *Domestic dynamics and wage labour: a case study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QwaQwa*, *Afr. Stud.*, vol.47, 1988, p.121-144.

Reynolds P, *Childhood in Crossroads: Cognition and society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Philip, 1989.

J Swart, *Malunde: The Street Children of Hillbrow*, Johannesburg: Wits. Univ. Press, 1990.

Jones S, *Children on the move: parenting, mobility, and birth-status among migrants*, In Burman S, Preston-Whyte E (eds). *Questionable Issue: Illegitimacy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7-81.

R.J. Gordon, *Southern Africa Revisited*,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2, 1993, p.83-105.

James D, *Musical form and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black South African music*, *Rad. Hist. Rev.*, vol.46, 1990, p.309-320.

David Copland, *Fictions that save: migrants' performance and Basotho national culture*, *Cult. Anthropol.*, vol.6, 1991, p.164-92.

NS Ndebele, *Rediscovery of the Ordinary*, Johannesburg: COSAW, 1991.

J Ferguson, *The cultural topography of wealth: commodity paths and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in rural Lesotho*, *Am. Anthropol.*, vol.14, 1992, p.55-73; Peters P, *Manoeuvres and deb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d rights in Botswana*, *Africa*, vol.62, 1992, p.413-34.

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地方暴力与冲突的研究，对族群关系以及社会精英的研究等，这些都在不同层面反映南部非洲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四、南部非洲人类学联盟及其刊物

南非是南部非洲人类学研究的重镇，这里的很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比如金山大学、南非大学、比勒陀利亚大学、罗德斯大学、开普敦大学等。由于殖民统治的瓦解，人类学在南非曾出现过严重的认同危机，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有很多人类学家离开了南非，人类学在各大大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适应，人类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恢复，《南部非洲人类学》(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杂志曾任主席迈克尔(Michael de Jongh)指出，目前南非人类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证人类学者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制度框架下继续最适宜地发挥作用，并且享有学术空间和必备的基础设施以让人类学者能够坚持自己的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南部非洲人类学发展情况，笔者将重点介绍“南部非洲人类学联盟”(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简称 ASnA)以及与之同名的唯一一本南非本土人类学刊物《南部非洲人类学》。ASnA 是一个专业的联盟组织，由生活工作在南部非洲七个国家的人类学家组成，它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举办一次人类学会议，以及出版一本半年刊杂志即《南部非洲人类学》。

事实上，现在的 ASnA 是在 2001 年由两个联盟合并而成。笔者简要介绍一下相关历史背景。在南非，曾有两个人类学家联盟组织，一个是南部非洲人类学联盟(Association for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简称 AASA)，一个是南非文化人类学家联盟(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简称 SASCA)。一般而言，AASA 的成员来自讲英语的大学，SASCA 成员来自讲阿非利加语的大学。两个联盟的分立不仅是在语言上，在认识论与意识形态上亦有所不同。AASA 主要继承了英国人类学传统强调社会人类学的研究，SASCA 则主要继承了德国人类学传统强调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两个联盟各行其是、互不往来，给南部非洲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带来不少困扰，对人类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很不利。在此背景下，两个联盟终于在 2001 年 4 月的一次联合会议上确定合并成一个新组织即现在的 ASnA，并且选举出新的委员会，制定出新的规章制度。

ASnA 的成立大大促进了人类学在南部非洲的发展，人类学者之间消除了差异，统一在一起，用一个声音说话，扩大了人类学的影响力。南部非洲的人类学者们需要让公众知道人类学的重要性，要让公众意识到人类学在很多发展与研究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才能让这门学科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由 ASnA 主办的《南部非洲人类学》刊物成为南部非洲人类学家交流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每半年出版一期，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南部非洲人类学的发展。

Michael de Jongh, Deconstruct, self-destruct or reconstruct: the state of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vol.25,2002.

David Bogopa, Merging of the two Associations of Anthropologists in South Africa, *The Af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2001.

五、小结

根据迈克尔所做的统计，人类学在南部非洲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状况。在南非，有七十多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在培养上千名人类学本科生及两百多名研究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习俗到时事热点，从社会实践到理论批判。南非的人类学者也能够申请到来自国际、国内基金会以及 NGO 组织的经费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充分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创作出好的作品。所有这些都使人相信，人类学在南部非洲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生机盎然地发展下去。

事实上，非洲的人类学家们总是不能或不愿在认识论上中断与殖民地人类学的关系。黑人人类学者至今无法提出一个清晰的“非洲人类学”定义，也缺少理论框架来引导他们的讨论，更无法指出他们的人类学研究范畴，致使这里的白人人类学者及其所做工作长期以来被视为种族主义的缩影。如今的白人人类学者还时常隐藏在所谓“后殖民”、“后种族隔离”的自由改良主义背后，黑人人类学者则在寻求“多学科”或者“发展研究”的庇护。前者真的能够将人类学和他们自身去种族化吗？而后者能够做出他们自己的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应对所有外来者吗？面对这些疑问与挑战，非洲的人类学家们该何去何从呢？也许正是在这些质疑声中，人类学在非洲依然能够艰难前行并获得新生。

[作者简介] 徐薇（1981~），女，辽宁沈阳人，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非洲人类学、非洲传统部族社会变迁、在非华人生存状况等。浙江金华，邮编：321004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 688 号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邮箱：anxingcai@gmail.com

（本文受到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的资助）

Review of the Anthropology Researches in Southern Africa

Xu Wei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was over one hundred years in Southern Africa. Many famous theories, methods and academic debates all originated from the anthropologists' long-term fieldwork on the continent. This article overviews three famous anthropologists' experiences and their works according to three history periods of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 Meanwhile the article

Michael de Jongh, Deconstruct, self-destruct or reconstruct: the state of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vol.25,2002.

summarizes the transition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Africa. We can say that the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AS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 and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ng among anthropologists in Southern Africa.

Keywords: anthropology; South Africa; British Anthropology; German Anthropology